



▲中國社會受多重因素影響，同樣面臨男女比例失衡問題，並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社會行為的變化。
資料圖片

經濟觀察家

性別失衡可能是加劇社會競爭行為的無形之手，並通過千千万萬家庭的決策，在不知不覺中重塑經濟和社會。嘗試躺平面臨階層滑落的風險，拚命內捲同樣看不到終點。但當我們看清了那隻「無形推手」如何運作，就已經邁出了走向真實改變的第一步。

性別失衡加劇社會內捲



社會觀察
魏尚進

近期熱映的電影《奧德賽》改編自荷馬史詩：伊薩卡城邦國王奧德修斯率領600名子弟出征特洛伊，戰爭加上歸途漂泊一共離家20年。後世有學者估算，出征前伊薩卡本土總人口近3000人，青壯年男性約1200人。大批男性遠赴戰場，客觀上造成當地男女比例嚴重失衡。來自周邊島嶼的108名貴族藉機湧入王宮，他們以求娶王后珀涅羅珀為名，長期盤踞王宮揮霍王室財產。戰爭的硝煙雖未直接波及伊薩卡，但戰爭帶走大量男性造成的性別結構扭曲，持續發酵了整整20年。

這則古老故事，可以為理解性別失衡帶來的社會影響提供一個參照。當下中國社會，受多重因素影響同樣面臨男女比例失衡問題，並由此引發了一系列社會行為的變化。

在正常的人口結構中，出生時男女嬰兒性別比約為106：100。由於男孩夭折率略高、且丈夫通常比妻子年長兩歲左右，到了適婚年齡，男女比例會自然趨近於100：100。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初起，新生嬰兒性別比一度偏離正常範圍，在2004年達到歷史最高峰121.18：100。也就是說，每出生100個女孩，就多出生21個男孩。此後雖有所回落，但即便2024年出生人口降至954萬，出生人口性別比仍高達111.7。這也提示，男孩偏好並未完全消退，且可能出現新的表現形式。

根據2020年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當年全年齡段男女比例為105.07：100，全國男性比女性多出3490萬。將統計口徑縮小到20至40歲的適婚年齡段，男性比女性多出1750萬；在0至19歲之間，男性比女性多出2100萬。這些數字告訴我們，在當前及未來的一段時間裏，婚配「市場」至少會盈餘3000多萬男性。這個數字超過了加拿大所有成年女性的總和，也超過了澳洲與新西蘭所有成年女性的總和。

在數學概率上，每8位適婚年齡男性中，就有1位面臨較大的婚配競爭壓力。農村地區的情況更為嚴峻。根據《中國縣域人口發展報告》，中西部部分偏遠農村適婚年齡段男女比例高達140：100，25至49歲的未婚男性規模超過1300萬。出生性別比偏高與選擇性別終止妊娠有關。其背後通常涉及男孩偏好、胎兒性別鑒定技術擴散，以及特定時期的生育政策環境等多重因素。各因素在不同地區和時期的作用並不相同，但其疊加可能導致性別比明顯偏高。

性別失衡如何演變為大眾日常感受到的內捲？當適婚年齡段男多女少，婚配競爭壓力首先會落在男性及養育男孩的家庭身上：為了增加相對競爭力，他們更傾向於儲蓄、買房、投入教育，並接受更長工時或更高強

度的工作。但競爭並不止於此。教育、職業與更充分的發展機會始終稀缺，養育女孩的家庭同樣可能增加教育和職業發展投入，希望女兒擁有更廣闊的選擇空間；一些女性也會通過教育、職業與財富積累，增強自身的獨立性與議價能力。於是，一場始於婚配市場的競爭，逐漸外溢為更多家庭共同參與的社會性「加碼」。

被推倒的四張骨牌

2009年前後，筆者與其他教授在研究中國家庭儲蓄時發現：一個地方適婚年齡段男女比例越失衡，當地家庭儲蓄率往往越高。他們把這套機制叫做「競爭性儲蓄動機」。傳統的儲蓄理論認為，人們存錢是為了養老、應付意外或者出於文化習慣。競爭性儲蓄是為了提高自己或孩子在婚戀市場上的相對競爭力。

面對加劇的婚配市場競爭，有男孩的家庭會問自己：我能做什麼來提高孩子在婚配市場上的競爭力？答案很直接——攢錢、買房、上好學校。研究估算，1990年至2007年中國家庭儲蓄率的增幅中，大約有一半可由「競爭性儲蓄」機制解釋。

競爭性儲蓄的增加，是倒下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隨後是房價。房產既滿足居住需要，也常被視為婚配市場中較易觀察和比較的經濟條件。2010年一項調查顯示，不少受訪母親不願女兒嫁給無房男性。模型估算，在2003至2009年中國35個主要城市的實際房價漲幅中，約有30%至48%可由與性別失衡相關的因素解釋。

房價升高後，為了獲得更多購房資本，第三張多米諾骨牌——職場，也隨之倒下。在研究所使用的農村家庭樣本中，來自性別失衡較嚴重地區、且家中有未婚兒子的家庭成員，更可能外出務工或接受風險較高的工作。數據顯示，有男孩的家庭平均每年離家工作41.4天，高於有女孩家庭的24.9天。家庭成員承擔風險，往往與改善家庭經濟條件、提高子女婚配競爭力等動機有關。

這串多米諾骨牌還沒倒完——第四張牌，是教育。婚戀市場的競爭壓力，不會等孩子長大才開始。它往前傳導，落到了下一代身上。家庭可能增加對子女的人力資本投資。在全國33個城市樣本中，學區房平均溢價約17%。但拆分來看更有意思：性別基本平衡的城市，學區房溢價均值只有9.47%；中度失衡的城市漲到15.89%；到了重度失衡地區，這個數字飆升到31.36%。補習班、興趣班、私立學校，一樣都不能少。中國家庭教育支出佔家庭總支出的7.9%，高於韓國、以色列、日本等國。

此外，城市間數據還顯示，性別失衡較嚴重地區的新增民營企業數量更多，這一現象與男性為更快積累財富而選擇創業的機制相符。這種競爭

壓力還可能通過產業鏈傳導至外貿領域。一國的貿易順差，本質上是其國內總儲蓄與總投資之間的差額——若性別失衡推高總儲蓄率，便可能對貿易順差產生影響；貿易順差的形成還受到投資、匯率和全球需求等多重因素影響。

競爭的理性與低效

與性別失衡相關的這些競爭行為，有一個共同特徵：從個體角度看是理性的，從社會整體看是低效的。對單個家庭來說，多存錢、多加班、多報補習班似乎能切實提高孩子在婚配市場上的競爭力。當所有家庭都同步增加資源投入時，婚配市場的總體配對結果保持不變。我們可以用「雄性麋鹿角」進行類比。每隻雄鹿都拚命吸收營養把角長得更大，以便在角鬥中獲勝獲取交配權。當所有雄鹿的角都變得同樣龐大時，它們之間的相對勝負關係維持原狀，過大的角反而大大增加了日常在森林中被樹枝卡住的危險。

「躺也躺不平，捲也捲不贏」成為了多數人的真實處境。單方面選擇退出競爭，個人在婚配市場上的相對位置會立刻下降，面臨更加不利的結局。這種典型的囚徒困境式社會均衡，使許多人難以輕易退出這場低效的競爭。研究估算，在過去四十多年裏，中國年均約9%的實際增長率中，大約1.8個百分點——也就是約20%——可與性別失衡引發的競爭行為聯繫起來。然而，為了這額外的增長，人們可能犧牲休閒、健康和家庭生活質量，而這些投入在宏觀層面未必改變婚配市場的總體結果。

打破內捲這場囚徒困境，需要正視並逐步緩解人口性別比例失衡問題。而要改變性別失衡，就需要改變社會中重男輕女的思想。提升女性經濟與社會地位，是糾正重男輕女思想的一把鑰匙。女性能夠創造更多經濟價值時，重男輕女的思想可能在現實利益面前逐漸鬆動。

但觀念的鬆動只是第一步，性別比失衡的修復，還需要更漫長的周期。我們則須建立漸進式的社會協調機制，引導全社會平穩過渡。在社會政策層面，完善育兒支持、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有助於減輕家庭的預防性儲蓄壓力；在社會與文化層面，繼續嚴格落實對非醫學需要胎兒性別鑒定和選擇性別人工終止妊娠的監管，並提升女性的經濟與社會地位；在教育領域，推動評價標準更加多元、完善職業教育發展通道，也有助於緩解單一賽道上的過度競爭。

增長本身不是目的，人的幸福才是；讓競爭服務於人的發展，而非吞噬人的生活。良性的繁榮，始於兩性平等，歸於人民幸福！

（作者為復旦大學國際金融學院訪問教授，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與所在機構無關）

亞洲多國推新政刺激生育



人口經濟學
梁建章

新加坡統計局發布最新數據顯示，2026年一季度新加坡出生人口6680人，同比減少950人，降幅為12.5%。如果2026年新加坡生育率繼續下降，那麼很可能會成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國家。

上周新加坡總理黃循財在國慶群眾大會上宣布，從明年新財年起，實行SG養兒育女配套（SG Child Support Package），為每名新加坡孩子提供高達6.2萬新加坡元（約合人民幣33萬元）的資助，非婚生子女也同等享有，同時還推出一攬子生育支持措施。

相較於新加坡，中國目前的低生育率形勢其實更加嚴峻。首先，中國限制生育的時間遠比新加坡更長。從1970年到1986年，新加坡節育政策僅持續了十多年，而中國自1971年開始推行計劃生育至2021年實質上取消生育限制，歷時半個世紀。新加坡是個小國，船小好調頭。中國是個大國，各種觀念、社會機制的慣性遠比新加坡更大，應對低生育率問題將更加艱難。

其次，中國過去限制生育的力度遠比新加坡更大。新加坡限制生育最嚴厲的時候也允許生育兩個孩子，對三孩的懲罰不過是取消一些相關福利，而中國計生政策在城市裏普遍只允許一胎，農村一般也只是允許頭胎是女孩的家庭生育二孩。

再次，新加坡在生育率處於1.6的時候，就意識到低生育率的危害，果斷停止節育，並開始鼓勵生育。而中國在2021年取消生育限制的前一年，2020年生育率只有1.3。

近年來日韓新都加大了生育補貼的力度。中國近年來的生育率已經下降到1.0左右，如果不加大生育支持政策的力度，未來幾年中國的生育率很可能會低於韓國和新加坡。

新加坡畢竟是一個小國，本國人口的萎縮可以靠引進外國移民來彌補。但中國是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中國的人口問題只能靠自己來解決。由於中國不可能依靠移民來解決低生育率問題，並且中國擁有全球最大的物質生產能力，所以中國加大生育補貼力度的能力和必要性遠超過韓國和新加坡。

低生育率的癥結是養育付出的主要是家庭，受益的則是全社會。只有讓養育三個及以上孩子能獲得不亞於普通全職工作的收入，才能激發家庭足夠的生育意願，並能緩解就業壓力，又能提振消費。因此，解決低生育率問題的關鍵，是讓養育成為有收入的工作，確保養育家庭獲得的收入穩定和可預期。

那麼，中國需要發多少錢，才能提升生育率呢？可以根據韓國近年的發錢補貼生育金額及生育率提升的幅度來進行粗略的估算：韓國育兒補貼現值／人均GDP現值在2021年只有1.6%，2022年上升到2.7%，2025年進一步上升到4.8%，所以近年生育率持續上升。2023年韓國生育率下降到最低點0.72，2026年生育率預計上升到0.90，也就是比2023年提升25%。

參考韓國，如果未來兩三年中國要把生育率提升25%，即從2025年的1.0左右提升到1.25，育兒補貼現值／人均GDP現值需要達到4.8%，如果按照這個比例發放育兒補貼，相當於每月855元發到六歲，總額為6.2萬元。

需要說明的是，上述估算可提供一定的參考價值，但不一定很準確，因為近年韓國生育率上升，發錢雖然是主要因素，但可能還有其他一些次要因素。

加大託兒服務投入

中國生育率提高到1.25還是遠遠不夠的，最終目標應該是要把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2.1）。所以，需要進一步加大發錢補貼生育的力度，比如每月每個一孩1000元、每個二孩2000元、每個三孩及以上3000元；或者每個孩子（不分孩次）每月補貼1500至2000元，直至孩子年滿18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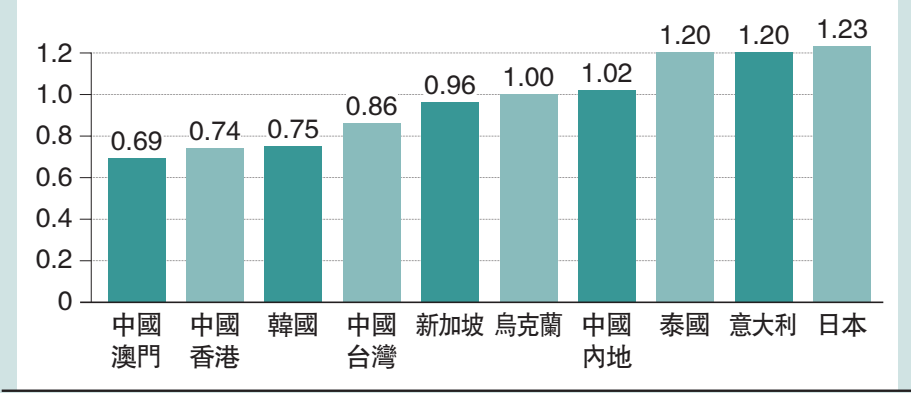
除了生育補貼以外，還需要大力發展普惠託育服務。中國0-3歲嬰幼兒家庭中，有三至五成存在託育需求，但實際入託率不足8%，而挪威、法國等發達國家入託率普遍超過50%。建議加大普惠性的0-3歲託兒服務投入，並進一步實現3-6歲學前教育全覆蓋，向下延伸到與產假銜接。另外，新加坡新政增加在職家長的育兒假等措施，也值得中國參考。

盡快將生育率恢復到可持續的更替水平不僅造福於後代，也對當下具有根本性的現實意義。只要政府表現出提升生育率的堅強決心，如宣布在十五年內將出生人口逐步提升到1500萬到2000萬水平的願景，經濟發展的預期和信心很快將會恢復，經濟表現將進入上行通道。

中國現在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關鍵問題幾乎都是卡在超低生育率上，未來的社會發展與長期國力，高度取決於是否能盡早將生育率提升到可持續的更替水平。我們相信，只要充分認識將生育率提升到更替水平是必要做到的，而且越早做到越好，那麼中國完全可以創造奇跡，成為第一個真正解決低生育問題的世界大國。

（作者為攜程集團執行董事長）

低生育率的國家與地區



資料來源：聯合國《世界人口展望》

票王效應 新盤市場趨旺



樓市新態
陳永傑

樓市焦點重回一手市場，九龍新盤「爭崩頭」，首輪收逾4.7萬票，出現數百人爭一個單位，中籤難度比資助房屋更高。一手熱銷激發了買家入市意欲，帶動整體樓市交投全面升溫。

8月下旬新盤市場氣氛升溫，西南九龍新盤觀環Ⅰ，憑藉低價開售策略成功引爆市場購買力。項目首輪累收高達4.7萬個認購登記，超額認購逾260倍，一舉刷新今年初新地西沙SIERRA SEA（第2B期）的紀錄，榮登歷史首輪收票量最多的「新盤票王」。

項目總收票量驚人，但發展商首輪僅安排180伙發售，出現極端的供求失衡，現場抽籤氣氛更是空前緊湊。更值得注意的是，在這180個單位中，留給一般散客的B組僅餘98伙配額，B組錄得3.89萬個登記，相當於397人爭一伙。今次搶盤熱潮不只是散客瘋搶，連大手客亦爭得火熱。激烈競爭下，散客要脫穎而出全憑運氣。

若對比最近兩期「居屋2024」及

「居屋2025」約十多倍的整體超額認購，觀環Ⅰ中籤難度比資助房屋更高，徹底刷新了近年散客搶盤的難度上限。

樓市料整固後再上

「票王效應」迅速帶動整體一手市況。在觀環開售的周末（8月22及23日），一手市場共錄得近250宗成交，不但較前一週僅約105宗急升1.3倍，更創下自今年5月以來逾三個月的單一周末新高。見市場氣氛升溫，其他發展商亦加快推盤步伐，爭相分一杯羹，新盤百花齊放，8月全月一手成交量更有望重新突破1000宗大關。

除了新盤市場持續高溫，大批未能如願中籤的向隅買家怕遲買更貴，紛紛轉投二手市場尋覓心水單位。在觀環Ⅰ開售的同一個周末，二手市場同樣受到提振，十大屋苑成交量回升至17宗，為近12個周末以來首次重返雙位數，創下三季度表現最亮眼的周末。購買力逐步釋放，預計整體樓市在整固過後將持續向好。

（作者為中原地產亞太區副主席兼住宅部總裁）